

# 張其昀與政大復校

● 徐有守（政治大學及文化大學教授）

## 指南山下政大復校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中央政府遷臺之初，臺灣以光復未久，大戰之後，百事落後，生產凋零，稅收低微，強敵中共虎視眈眈於對岸，全臺充滿一種壯烈氣氛。故充實武備，鞏固防衛，確為求生存之第一要務。在軍事優先原則之下，當時有一種說法：為免影響兵源起見，不宜多設大專院校云。及至先後有金門大捷、登步島大捷、韓戰爆發、第七艦隊巡行臺灣海峽、簽定中美協防條約等事實發生後，臺灣局面始告安定。臺灣乃開始稍有餘力以注意軍事以外之建設。

在教育方面，各方開始考慮日治時代所留下原有高等教育設施之不足；因而，大陸上原有各大學在臺校友，遂紛紛要求其母校在臺復校。但數年以還，無一獲准者。至四十二年冬，國立政治大學（簡稱政大）竟得首先復校，其中關鍵，實乃時任教育部部長張其昀先生所促成。至今回顧，忽忽四十一年矣。指南山下，政大校舍，漫漫一片，氣勢

恢宏，不知已為國家造就多少人材。至於其他各校之復校，均遠在政大之後多年。

某年，張其昀先生八十大壽。我政大復校之初所設教育、政治、外交、新聞四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在台者三十餘人，集議為先生賀。並商得海外同屆畢業生二十餘人一致響應，乃集資購一大型玻璃屏風，與其昀先生華崗文化大學之秘書人員約定時間，共乘一大巴士往賀。其昀先生特選一小型會議室接見，甚為親切。其昀先生自創辦文化大學後，其全部精力時間，幾均投入，而對其他事務，本已不甚有暇注意及之。但是日見我數十同學聚集一堂，似有感觸，以敘家常氣氛坐談良久。

筆者記憶最深者，為所談當年政大復校決定之經過情形。其昀先生言，當時往請示先總統蔣中正先生之措辭為：今政府遷徙來臺，百廢待舉，均用以充實反攻復國之基礎。現武職之黃埔軍校，業已在臺復校；而文職之黃埔（即政大），是否亦有考慮規畫予以恢復之必要，用以配合光復大陸時，繼武

力挺進後對光復地區建設工作之需要。蔣總統聞後遂詢問：問題是在應以何人辦理其事為宜？其昀先生遂提出浙江海鹽陳百年（大齊）先生以應。蔣總統立即欣然表示同意。此一研究醞釀數年之事，遂告定案。前後數分鐘而已。

此事如此順利，自有其背景：第一、臺海整個局面已趨穩定。第二、儲訓人材，以配合反攻大陸之需，自屬必要。當年蔣中正先生北伐，固賴黃埔學生在前浴血克敵，亦幸有政治大學前身之黨務學校畢業生，隨軍隊之後，從事光復地區之治理建設工作。此一經驗，即其昀先生所稱之武職黃埔與文職黃埔也。第三、陳大齊先生為浙中耆宿，夙以精研孔孟之學與理則學著名。早年曾任北大代理校長及考選部前身考選委員會第一任委員長，乃一恂恂然儒者，蔣總統固夙已知之。既得人矣，復校事可成。

## 熱忱感人勉勵學生

政治大學於民國四十三年復校，其時國

家財政困難，百事唯艱，復校一事，至為不易。初期之慘淡經營情形，至堪一述。茲僅就個人當時所知，以及現今記憶所及，略予簡述，以稍留記錄。

首先為校址與校舍問題，在百般困難之下，在部長張其昀先生指示下，由教育部決定，將該部所有在木柵指南山下，備供戰爭爆發時作為疏散辦公使用之房舍，以部份無條件借予學校使用。該批疏散房屋中，有部份已作檔案儲存室之用，教育部全部檔案均存置該處；另有部份房屋則暫空置。經教育部自動以其中一座四合院式之空心磚牆瓦頂平房一棟借予政大。該屋有房六間，經以兩間改充教室，分別可容納約七十人及約三十人；以一間約十餘坪大者作為圖書室；二間各約七、八坪面積者均作為職員辦公室；最小之一間約莫僅四、五席大小，則為校長辦公室。另在離此四合院約四、五百米之處，有木造魚鱗板牆上蓋油毛氈屋頂平房兩棟，據說本係揚子公司所有。其內部原已間隔成三十餘小間，中間貫以甬道。就其形式觀之，似乎原即為單身職員宿舍。不知係由教育部經過何種手續取得，以之供作我等學生宿舍之用。此宿舍內原即附有廚房與可容六、七十人使用之膳廳各一間。

復校的籌備工作似稍匆促。所幸在張部長其昀先生領導之下，教育部對諸事均熱心勇為，自發自動代勞，學校乃得在民國四十三年內開學。開學之日，假教育部舉行典禮

。張部長致詞，詞意熱忱感人，以美國普林斯敦大學高級研究所設置於一稻田內為例，所內設備簡單，但卻係偉大學人諸如愛因斯坦等瞑思、閱讀、與研究之最佳場所，成就輝煌云。並復引用詩句「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以勉勵學生。後諸生於十月入校。赴校之日下午，由教育部備供上有油布遮篷之運貨大巴士二輛，自中山南路教育部部址（今臺灣大學醫學院地）出發，免費運送全體學生五十六人，前往木柵學校。是日天氣微寒，風雨交加。學生中約有半數係於三十八年間自大陸隻身流亡來臺者，均自願辭去職業投考而經錄取，此時又投身於此一段新人生里程，前途如何，無從預知。但目前之情形則為，獨身攜帶行李，前往一陌生地方，且將在其地居留學習至少二年（碩士研究生修業期限至少二年）。此時車外豪雨傾盆，筆者不禁百感交集，愁緒滿懷；身如浮萍飄流之感，油然而生。

抵達學校宿舍，雨勢稍緩，車停溪邊，學生一一下車，自行揹負行李，拾級步下溪岸，越過亂石作橋之溪流，始到達稻田圍繞之學生宿舍，業已下午五時許。各人進入房間，兩人一間，自動組合。是日廚房內據稱有鍋但無鍋蓋，亦無廚師，故尚未開伙，不能供應晚餐。而屋外對岸山路上，泥濘沒膝，淒風苦雨，難以外出。縱欲外出，亦須步行約二十分鐘之田路，始能到達斯時之木柵街道有店家之處。故大家只好留在宿舍內。

同學彼此初次見面，相互多不熟悉，於是只好各自在舖有榻榻米之床上，空腹枯坐。及夜之來臨，由於電線尚未接好，亦無電燈。各人只好與同室另一同學，在黑暗中談天。此為復校後抵校第一天情形之大概。

### 師生有如家人朋友

復校之第一學年，尚無大學部，僅有研究所，設公民教育、行政管理、外交及新聞等四個研究所。至第二學年，公民教育所與行政管理所分別改名為教育所與政治所。第一學年報到入學之學生，計五十六人，平均每所十四人，清一色為男士。

由於四研究所有一半課程為共同科目，五十六人常在同一教室上課；且同住於兩棟密鄰宿舍之中，每日三餐又在同一小膳廳中用膳，確為生活與學習相結合，故為時不久後，彼此均甚熟悉。且至今數十年來，相互情誼至篤。

不分晴雨，同學均步行前往數百米外之教室上課。課後中間休息時，遇逢天氣晴朗，同學則在四合院之中庭站立吸煙談天。遇有任何大小問題，年少者不懂事，動輒立即往校長室逕行面報校長，或逕找有關職員。有時同學進入校長室面見校長，其他同學則在走廊上低矮之窗邊觀看校長與學生談話情形，一一耳聞，全無遮攔。全校師生職員之間，確如家人朋友，絕無隔膜，至為愉快。復校第一年之學校組織，亦甚簡單。校

長陳大齊先生之下，有秘書長一人，下設教務、訓導、總務三組。第二任秘書長為賀翊新先生。公民教育研究所所長為陳雪屏先生，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為邱昌渭先生，外交研究所所長為崔書琴先生，新聞研究所所長為曾虛白先生。各所教授均一時之選，但大多數為兼任，僅少數專任。

首期同學年齡相差頗大，筆者當時三十歲，而最長之學生齊覺生較筆者長約逾十歲；最年輕之李厚白、陳偉益等，比筆者又約少十歲。故有相差二十歲之情形。最年輕者多係當年剛從大學畢業，歲數較長者則多早已畢業，且已在社會工作若干年，其中頗多係當年大陸來臺之流亡學生，飽經世故風霜，頗有歷練。同學間雖有如此懸殊之年齡差距，但相互仍甚愉快，從無隔膜。甚至有調皮之年輕同學，常主動支配領導年長之同學，而年長者亦從不以為忤。

同學中百分之九十為單身未婚，且多屬身無長物之窮漢。斯時教育部給予每一研究生每月公費新臺幣三百元。其中需付伙食費一百五十元，所餘一百五十元供筆墨紙張零用之資，境況至為困窘。因此輩研究生多曾任職社會，不無友朋，仍常有婚喪喜慶通知寄來。每接獲一紅白請柬或通知，至少即需致送一百元聊表關切；如一月之內接獲通知二張以上，即須舉債以應，故內心常為之恐慌不已。在無可如何之時，他人如何應付，非我所知；但筆者之辦法是橫下心腸，復函

托詞不去，此亦不得已也，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在此種情形之下，筆者既無任何慾求，又無虞於饑餓，在校兩年期間，心靜如水，得以專心讀書，不亦快哉。時光匆匆，至今忽忽四十一年，每一思及，一切猶如昨日，內心時懷感念。

### 終身治學增加知識

猶憶當時有一小故事，似堪在此一述。同學荆溪人兄，於午餐桌上談：有人告以，爾等往讀政治大學此種學校，設備簡單，究竟可望有何收穫？實無意義云云。按諸當時情形，學校確為設備簡單。但荆溪人兄答以：我原有多少智識，應仍為我繼續所有，決不致因讀政治大學而減少或喪失；但我既在此學校上課聽講，且老師均為名教授，無論我多愚笨，智識上多少總應有所增益。則讀此學校，於我又何傷焉。既無傷焉，反之即有收穫，於我畢竟有益云。同桌同學聞後鼓掌稱快，深佩其說理正確得當。

事實上，辦理文法性質學校之第一要義，要有好教授。第二要義，則為要有好學生。所謂好學生，乃指天資好，肯努力，專心向學無旁務者而言，第三要義，要有圖書供應。政大之研究所初期人少設備較簡，但卻兼備此三條件。此外，更有研究所教育之下列幾種特性，必須貫徹。即研究所所能給予學生者，優良教師所授之智識固屬重要，但教授所能給予學生之智識，無論如何，畢竟

有限；最重要者，在研究所之施教模式下，下列三點特性，用以訓練學生今後自行有效增加知識，其有助於學生者尤多：(一)培養學生之治學興趣。(二)使學生學得治學之正確方法。(三)有助於學生立定終身治學之決心。

筆者係讀政治所，第一屆研究生畢業前，所長浦薛鳳先生曾邀集一茶會，請有校長、本所全體教授、以及全體畢業生，共同參加。師長講話畢，命學生各述其志。猶憶馬起華兄起立慷慨致詞謂：「從今以後，有生之年，便是我治學之日。」筆者聞後為之欣賞不已，亦欽佩其慨乎言之；實則已道出我輩共同心聲。

試觀當年入學政大研究所已畢業之同學，今日在社會上多不無成就。或為某方面之專家，或為名教授，或著作等身，或在事功上有所表現，但均仍不忘治學。此種事實，足以證明筆者所言不虛，政大研究所之教成功也。

### 推廣教育氣象煥然

國產電影片金馬獎自民國五十年代前後開始辦理以來，為時業已三十年左右。對鼓勵國產影片製作，與促成影片素質之提高，均卓著功效。

對於國產電影片金馬獎之開辦，始於行政院新聞局。但倡議設置我國自辦自主之電影獎金，定名為「金馬獎」，以及其辦法之主要構想，則最早均始於教育部，張部長其

陶先生兼任主任委員之該部電影事業輔導委員會，且係出自筆者個人區區之創意。

民國四十年代初，張其昀先生任教育部部長。當時我中央政府自大陸撤退來臺未久，全國上下，痛定思痛。政府人員，自先總統蔣中正先生以次，內心無不充滿待罪之心，進而激生奮發惕勵之情操。蔣先生尤其經常檢討，認為我政府在大陸之所以失敗，終至整個大陸淪陷，其根本原因，實在於教育之失敗。此種觀念，至為強烈，在中央政府遷臺最初之六、七年間，蔣先生時時公開作此指示。故政府當時對教育督促特嚴，期許亦最為殷切。在此種背景之下，乃將原為執政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之張其昀先生，任命為教育部長，實寄厚望。

張氏奉任後，確不負層峰期許，自訂施政計劃，計劃項目之一為發動東方文藝復興運動，其內容著重在社會教育之推廣與發揮功能，諸如加強出版工作，成立中華話劇團，設置中華藝術團，規劃辦理空中教學，並在部內設置電影事業輔導委員會，以及其他種種新政。展佈多方，氣象煥然。

其時筆者方自政大研究所畢業。不悉係何因緣，獲張其昀先生閱及筆者所著已印行且曾獲文學獎金之話劇劇作數種。遂於某次會議時，在會議中面告政大校長陳大齊謂：「教部恰好新設一名為『電影事業輔導委員會』之新機構，正在物色曉悉電影、戲劇之人才，請大齊先生轉囑筆者前往教育部該委員

會任職云。筆者為學位論文所苦已久，論文口試通過後不及一週，方始喘氣，尚未及尋覓工作。聞此飛來好事，至為欣然。遂往謁其昀先生，並遵命即日就職為該會薦任專員。頂頭上司為該會第一組組長，由部內秘書室專門委員陳如一兼任。另有第二組，組長由中央黨部第六組負責港澳影劇界聯絡之黃總幹事紹祖先生兼任；再上級則為本委員會之執行秘書，由臺灣省新聞處處長吳錫澤兼任（當時臺灣省政府尚在臺北辦公）。本委員會之主任委員由其昀先生自兼，委員十餘人均由各業務有關機關首長或高級人員兼任。此外，會內尚有一助理員職務。以上即為該會當時全部工作同仁。其中每日實際到會簽到辦公者，僅有皆為專任之筆者與該一助理人員兩人。

委員會每月必定開會一次，均由其昀先生主持。議案則大多由筆者依據到會有關案件編擬。僅有極少部份議案，係筆者考慮所及而主動擬製列入。議程依行政程序送請陳如一及吳錫澤先後核閱後，再送部長兼主任委員核定。在此過程中，甚少更改。

### 國片金馬獎的構想

筆者於任職數月後，立即發現，世界各主要國家幾乎均有定期之電影展覽（即習稱之影展）與獎金之設置。舉凡邀請我國參展函件，斯時均係送教育部該會辦理，其時有一事給予筆者刺激甚深，我國為發起國之一

之亞洲影展，在日人某種程度之運作控制下，在該一期間我國竟不免有所受制。另外，西方國家所辦之各個影展，評獎時，純係採取西方文化觀點與標準，與我國文化之價值觀念，常有距離，影響我國電影製片內容者至鉅，間接更有所影響我國文化今後之取向。有此二種近程與遠程之影響，筆者乃興起與其求人何如自助之念，認為亟應設置國人自辦之電影獎金，以維持文化自立。

其時之筆者，僅曾有學校教育工作經驗。至教育部工作，則係首次從事行政機關工作，故不知此種創設性事項，且涉及需要其他機關配合至多者，在公務中屬重要事項，應先行與長官逐一口頭說明請示，而後再行簽報部長。筆者當時竟自逕行起草「國產電影片金馬獎設置辦法草案」，予以列入某次會議議程。所幸在議程呈核過程之中，一先得承寬諒，該案並未遭遇刪除或改變，亦未遭遇詢問，而得提出會議討論。僅在會議前，第二組黃兼組長曾輕描淡寫對筆者說：「你寫了一個金馬獎的辦法啊？」筆者未特別注意，僅答以「是」即罷。當時該案經會議討論後，決議似為：「應作進一步之規劃。」由於此事牽涉至多，故筆者於會後兼承會議決議進行推動，及作進一步之規劃。但數月，筆者即轉往執政黨中央黨部任職，此事遂擱置。料想教育部應尚有卷可稽也。此事實為響應其昀先生東方文藝復興與具體行動之一。數年後，見新聞局能有國產影片金馬獎之設置，內心欣喜，非言可喻。